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清代森林与土地管理

【美】孟泽思著 赵珍译 曹荣湘 审校

Forest
and Land Management
in Imperial China



Forest
and Land Management
in Imperial China

【美】孟泽思著 赵珍译 曹荣湘审校
清代森林与土地管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代森林与土地管理 / [美] 孟泽思著；赵珍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ISBN 978-7-300-09376-5

I. 清…

II. ①孟…②赵…

III. 森林资源-土地管理-研究-中国-清代

IV. S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75678 号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清代森林与土地管理

[美] 孟泽思 著

赵 珍 译

曹荣湘 审校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 - 62511242 (总编室) 010 - 62511398 (质管部)

010 - 82501766 (邮购部) 010 - 62514148 (门市部)

010 - 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 - 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48 mm×21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8.25 插页 2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24 000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大正 于沛 朱诚如

成崇德 李文海 陈桦

邹爱莲 孟超 徐兆仁

戴逸

《编译丛刊》编委会

主编 于沛

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美]孔飞力 王大庆 王江

王晓秋 [法]巴斯蒂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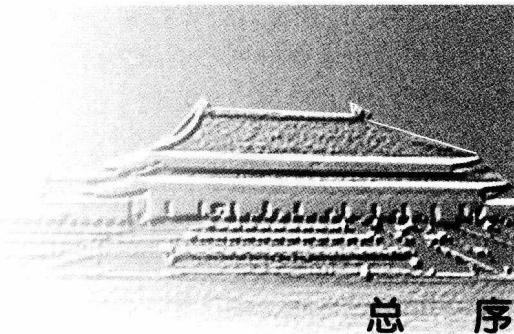
[德]达素彬 [俄]米亚斯尼科夫

朱政惠 刘东 张西平

[英]吴芳思 杨念群 赵世瑜

耿昇 徐浩 徐思彦 钱乘旦

虞和平 戴寅



总序

纂修清史是我国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它包括 3 000 余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及文献、档案整理和编译工作。广大史学工作者正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做好清史编纂工作，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世界各国从分散发展到趋于一体，大抵从 15 世纪、16 世纪开始，直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清朝从 1644 年到 1912 年共延续了 268 年，这是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的转折时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却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使封建社会的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 18 世纪世界历史的大变局中，康乾盛世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落日的辉煌”，而到 19 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清朝日益衰颓，已奏起了“落日的挽歌”。因此，研究清史，确定它的基本内容，以及确定研究它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时，不能脱离清王朝社会发展过程中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编纂清史时要有世界眼光，这已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不仅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还要放眼世界，博采众长，搜集和积累世界各国人士关于清代中国的大量记载，汲取外国清史研究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正是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以下简称“编译丛刊”）。

清朝建立之初，曾和世界各国保持一定程度上的接触。后来中国的大门一度被关闭而后又被强行打开，这期间，外国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军队、探险家、科学考察队蜂拥而来，东方古国的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惊奇。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他们记录下在华的所见所闻。这些记录数量浩瀚，积存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或私人手中，成为了解清代近三个世纪历史的珍贵资料。由于西方人士观察、思考和写作习惯与中国人不同，他们的记载比较具体、广泛，比较注重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因而补充了中国史料记载的不足。“编译丛刊”将从中选取若干重要资料译介给国内的读者；对早年问世的具有开拓性、奠基性价值，但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的作品，我们也将同样给予关注；此外，对反映当代国外清史研究新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的学术专著，“编译丛刊”也将及时地介绍给中国学术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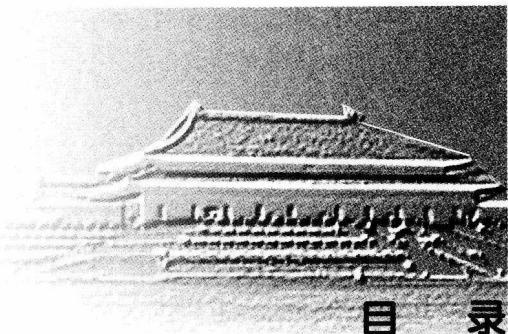
从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出发，有选择地介绍国外新史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是必要的。如西方历史学家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主要是强调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拓宽历史研究的选题；又如提倡“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努力将社会精英的历史变成社会大众的历史，将千百年来隐藏在历史幕后的社会大众推上历史的前台。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研究整体化趋势的推动下，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分支学科，如社会史、人口史、民俗史、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心理史、社会生态史、环境史、妇女史、城市史、家庭史等等，对于纂修清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这些都将在“编译丛刊”的作品

中有所体现。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不同文明间不断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任何国家的文化都是通过与异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获得营养，从而不断发展壮大。纂修清史必须排除闭关自守的文化排外主义的干扰，破除中西对立的僵化思维方式，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对待国外清史研究的一切成果，因为它们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愿“编译丛刊”在新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广阔背景下，作为一座科学的桥梁、友谊的桥梁，为纂修清史做出更多的贡献。

于沛

2004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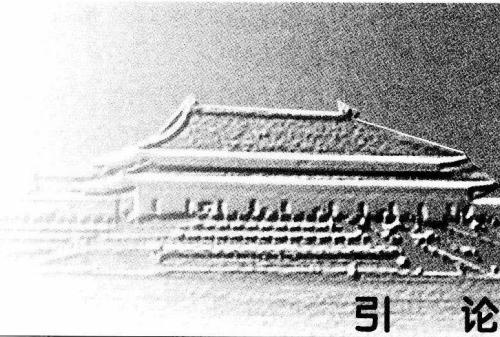
目 录

引论	1
第一章 中国的森林	6
森林植被	6
环境变迁：土地破坏与毁林	15
华北和西北地区	15
东北和南部地区	19
毁林的曲折途径	20
直接影响森林的力量	21
间接影响森林的力量	23
价值体系和文化观念	24
第二章 森林的稳定与衰减：一种细微的平衡	36
毁林问题	36
自然资源的保护	41



中国森林管理的条件	46
森林资源的定义	48
边界与遵守	49
可持续性	52
总结	53
第三章 皇家狩猎的木兰围场	57
狩猎，满族身份与合法化的象征	59
作为政令的自然保护	63
狩猎围场的衰亡	64
结论	65
第四章 寺庙与寺院森林	67
深山老林：一种资源景观	69
习惯、强制与有偿管理	71
结论	74
第五章 宗族、村落与公共用地	77
宗族土地	78
村落与公共用地	80
公共所有制的环境	82
集体土地的管理	84
宗族和村落森林以及公共财产理论	87
结论	89
第六章 农业体系中的树木	91
中国南部的树木和农业	92
市场联系	95
杉树与松树的管理	97
树木的控制与所有权	99
森林与少数民族	101
为什么种植树木：强制还是激励？	104
第七章 非木材林产品：薪炭、蚕丝和食用菌类	109
薪木和炭木	110
蚕丝和食用菌类	112

第八章 在大山深处：砍伐原始森林	115
土匪、伐木与荒野的平定	117
经济纽带：市场与木材砍伐期	120
控制与管理	121
限制定居和转换林地	124
第九章 讨论与结论	127
实施与遵守	128
毁林或森林管理——相关问题	132
对林产品及服务的需求	132
控制能力	134
适应性与对长期变化的反应	136
结论	139
附 录	141
本研究使用的方法	141
资料来源	143
参考文献	145
西文部分	145
中文和日文部分	164
方志与寺庙志部分	181
个人交流	183
论文附录	184
附录 1 战略空间：晚清中国荒地政策中的 驱逐与安置	184
附录 2 三百年历史的塔亚 (Taungya)：中国南方 可持续的森林管理体系	203
附录 3 云南省村民的环境史观	225
译后记	249



引 论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除了人迹罕至的“原始”丛林之外，无论是个体的人，还是社会的人，都在利用着森林，改变着森林的自然状态。在长期的狩猎和采集过程中，人们对特定树种的偏爱和喜好，改变着森林的组成成分。放火围猎或烧荒，改变着植被的完整性与延续性。人们将林地转换为农田的活动，剧烈地改变着地表结构。然而，从整个历史进程来看，人们也保护、种植树木成为森林。人们将林地作为战略地带而争夺。人们敬畏树木，因为他们认为树木有灵。人们种树是为了增加收入，种植或保护树木是为了解决干旱、土壤沙漠化或水土流失造成的洪水泛滥等问题。本书试图弄清楚在过去的三百多年里，在同一历史阶段、同一个国家内，为什么人们在保护、改善森林的同时，也在毁坏着森林。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森林，经过一千多年的利用与开发，人们很难想像出还存有史前的“原始”森林。事实上，天然的森林植被、丛林或草地早已被耕地所取代。阡陌纵横的梯田改变了山区的地形。社会动乱，诸如各种暴动、大规模的群众起义，都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创伤。战火、建造宫殿或为村落手工业的冶炼



炉提供燃料等引起的森林毁坏，都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留下了濯濯童山。^[1]

根据记载，19世纪来到中国的西方游客评述说，令他们吃惊的不仅是中国森林的缺乏，而且仅存的一小部分森林仍然在遭到无情地大肆砍伐〔Fortune（福钦），1857年；Wilson（威尔逊），1913年；David（大卫），1949年〕。20世纪早期发生的灾难性的洪水和饥荒，使一些人认为，毁林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的水土流失和土地的盐碱化，都是导致中国贫穷落后的主要因素之一〔Lynwood（林伍德），1901年；Lowdermilk（罗德民），1926年；Mallory（马罗立），1926年〕。

然而，在所有关于森林毁坏的报道中，有证据表明，在中国的许多地方，树木仍然在种植，森林仍然被维护。在一些村落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石碑上刻有保护乡村木材供给和林业用地的乡规民约（陈浦如和卢保康，1984年；孔宪周，1986年）。大量的乡规民约都包含了有关森林管理的规章与条例〔吴相湘，1962年；Menzie（孟泽思），1988年〕。在某些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中，一方面存在着广泛的毁林和林地转换为农田的现象，而另一方面也对林地进行着保护、维护和管理。

本研究考查了林地的毁坏与保护、维护和管理之间各种力量的平衡，而且从对毁林原因的探究出发，进一步讨论了在一种主流文化背景下，在一种不断把荒地转换为耕地的逆境中，森林管理体系趋向稳定的各种条件。关于中国的森林管理，我提出了三个问题：

1. 在毁林的大趋势中，森林管理的实施是否有一定的条件？
2. 假如实施条件存在的话，这些条件又是什么？
3. 导致森林管理体系趋向稳定的因素是什么？

我从中国历史资料中，找到了六种森林管理的形式（文后的附录给出了使用方法与资料的详细情况，141～144页）。这些实例从17世纪持续到19世纪晚期，有些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这一时间跨度包含了许多因素，一般认为，它们在诱发毁林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我选择的这一历史阶段之所以特别有趣，有以下几个原因。在这一历史阶段中，据统计，中国的人口增加了三

倍。农业生产与人口数量保持同步增长，这是通过扩大农业耕地面积和从新大陆引进农作物品种来实现的〔Rawski（罗友枝），1975年；Bray（布雷），1984年；黄，1985年〕。该阶段包括：明朝末年和清初政权巩固时期，以及19世纪清王朝的衰落和20世纪初期革命运动与起义时期。这一阶段，展示了一个这样的过程，即前期的社会繁荣和后期的经济衰败。选择这三个世纪作为一个研究阶段，也是考虑这样做有可能揭示工业发展对林产品日益增加的需求，以及这一需求的长期趋势如何影响到林地的利用和使用。

第一章简单勾勒出中国天然植被概况、毁林的过程与模式，并对森林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做出某些评论。第二章理论性地回顾了各种试图解释人类利用环境的复杂方式的思维模式。这些思维模式显示了人类利用环境，有时是为获得持续不断的经济利益而进行自然资源管理，有时则为获得眼前利益而开发自然资源，或者将自然资源从一种利用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利用形式。

后面几章详细地叙述和分析了森林管理体系的六种个案（参见图1）：

皇家狩猎的木兰围场，由清朝的皇家内务部（内务府）设于1671年。〔关于木兰围场的设置时间，有康熙二十年（1681）和康熙二十二年（1683）之说——译者〕该保护地位于热河的东北（河北省），受到中央政府直属军队的保护。

寺庙与寺院森林。寺庙与寺院周围受到保护的森林。

宗族、村落与公共用地。某些具有明确辖区的村落，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制定了具体的措施来保护和利用森林。

农业林。小规模地种植树木以出售到外地的市场。

经济林。人们种植树木是为了获取“少量”的森林产品：薪炭、蚕丝和食用菌。

原始森林。不定期的砍伐，包括皇室的征用。这通常发生在偏僻的山区。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情况在文献中没有完整的记载，但是，在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在某些情况下，森林在中国是得到管理的。

第二个问题不易于直接回答。它不能用因果关系的简单陈述来回答，也不能设定一套期待森林管理自然发生的条件来回答——因为每一种情况都有其独特性。任何一种林地的管理，都是在各种森林保护力量的对比较量中进行的。

第三个问题涉及可持续性的问题。对森林管理体系之间的差别与相似之处进行一定程度的概括是必需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对各种力量之间的平衡做出解释和描述，同时对这种平衡如何维持一段时间、如何失衡加以说明。

人们还远远没有认识到的是，森林管理体系在中国早已存在——与此相对的是，有关植树和官方痛惜毁林恶果方面的记载却是寥寥无几。关于一个具体的森林管理案例的任何完整的资料和记录，至今仍没有找到。目前已经发现的有关的管理资料是散乱的，它们很少直接涉及林业。这种结果展示给我们的就是一幅中国林业的图画。这幅图画就像一幅破碎的马赛克，而不是一幅可以完整理解的、清晰可见的图片。直接考察管理发生的条件，似乎是一种鲁莽的行为。本研究并没有穷尽一切可能，还不能够结论性地叙述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森林管理的程度与毁林的程度有关，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毁林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因而，有关什么推动着人们与该趋势相背而行的问题则油然而生。本研究本着初步探讨的精神来进行，完全相信后继的研究将能够为那些有待回答的问题、甚至还没有提出的问题提供答案。本研究还完全相信，这些后继的研究很有可能改变本书下面的许多结论。

【注释】

[1] 关于战火是毁灭森林的一种重要因素，请参见第 21~22 页。在中国的“大跃进”期间，人们毁坏大片的森林是为小型的冶铁炉提供燃料。大炼钢铁被视为当时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华南的许多地区，濯濯童山成了当时毁林的见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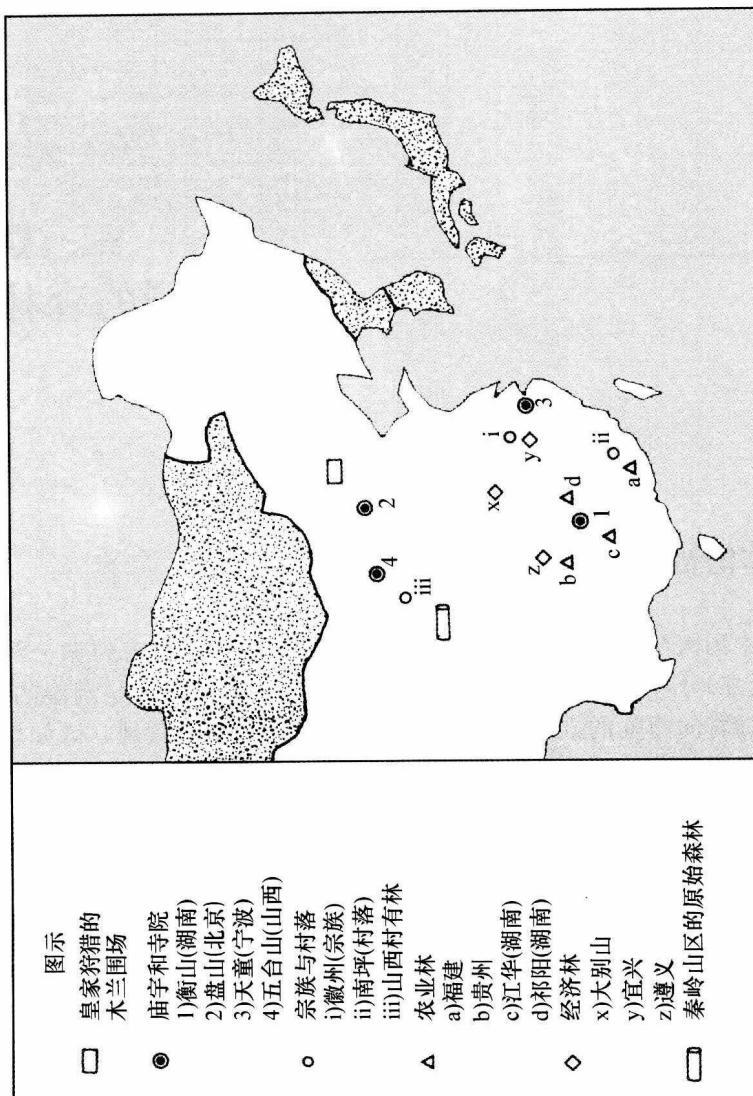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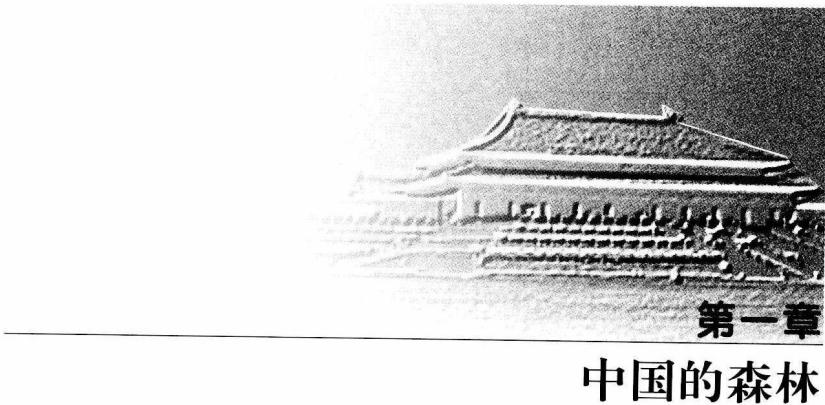


图1 清后期森林管理体系



第一章

中国的森林

森林植被

中国大陆北起黑龙江地区西伯利亚北部森林，南到湄公河（澜沧江）岸潮湿的热带森林。大陆东部沿海气候通常是潮湿的，降水随着向内陆的推移逐渐减少，到了中亚的干旱荒地，诸如塔克拉玛干沙漠，降水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1]中国包括截然不同的植物地理区、植被类型以及地区性的物种。西方的植物学家们在19世纪首次踏进中国内陆以后，就对它们产生了极大的兴趣。^[2]

数位学者曾试图对中国的森林植被进行分类并绘制分布图。他们的努力遇到了毁林程度的阻碍：尽管仍有可能来辨认哪类物种曾经在中国存在，但很难确定它们原始的分布，很难确定这些物种是否形成了茂密的封闭森林、开阔的林地，或者沿着河流与水道两岸形成了热带稀树草地。

他们提出的分类体系，都认同了相同植被分布范围。沿中国东部地区，他们确认了北部是针叶林区、南部是温暖的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以及热带季雨林区。向内陆地区进一步延伸，则出

现了向越来越明显的旱生林地过渡的地带，从树木茂盛的草地到半沙漠的灌木丛带（这一地带又叫做戈壁），直到沙漠和光秃秃的旱地。青藏高原通常情况下被划分为冻原区或高原沙漠。

这些分类体系基于地貌类型 [Handel-Mazzetti (汉德尔-马扎蒂), 1931 年]、地理区域 [Liou (刘慎谔), 1934 年]^[3]、居住因素 (王铮, 1935 年) 与土壤 [Thorp (索普), 1936 年]。1961 年, 王启无确定了植物区系与植物群落 (参见图 2)。这种分类方法用于探寻人类改变和利用植被的方式，并不总是合适。例如，像混合型的中生植物林，其覆盖的地区见证了人类定居的全部历史，定居范围涵盖了人口密集的、高度开垦的长江流域和主要由少数民族居住的贵州封闭山区。^[4]

一幅最新的中国植被地图 (侯学煜等, 1982 年)，把中国划分为 8 个主要植被区，其范围涵盖了北部混合型的落叶林区、针叶林区，以及高原半荒漠和荒漠地区。这些地区又分为 30 多个植被类型，其中的植物群落，可以在地图上绘制出来。^[5]该地图详细地描绘了当前的土地使用状况，但是潜在的或“非干扰的”植被覆盖与当前土地使用之间的区分是如何做出的则并不清楚 (参见图 3)。

历史地理学家文焕然提出把森林分为 5 个地带，它们包括共同的自然因素和人类利用资源的历史：

1. 大兴安岭区的北部森林与沼泽地带。
2. 小兴安岭区的北部森林。
3. 华北的温带森林。
4. 华中与西南地区的亚热带森林。
5. 华南的热带森林。

在早期的研究中 (孟泽思, 1985 年, 第 1 章)，我以文焕然的森林划分体系为参照，绘制了一幅具有 9 个植被区的地图。根据不同的定居与土地毁坏模式，我将把细分法引入华北温带林区的研究中，同时，还将文焕然提出的北部的两类林区合为一类，因为它们在 19 世纪末之前，很大程度上还是原生态的处女林。该地图在此被重新绘制为图 4，并详细地描绘了表 2 中每一区最重要的物种。